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古代西辽河流域 的游牧文化



序 彭杰 任爱君 杨福瑞◎等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代西辽河流域 的游牧文化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席彬杰 任爱君 杨福瑞 等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西辽河流域的游牧文化/席永杰、任爱君等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204—09311—3

I. 古… II. ①席… ②任… III. 辽河流域—牧民—民族文化
—史料—古代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4042 号

作者名单

席永杰 任爱君 杨福瑞 唐玉萍
李俊义 侯志 吕富华 郭小丽
孙杰

导 论

关于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理解

说到文化，自然会引起人们关于文化概念的普遍兴趣：什么是文化？界定文化的主要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也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具体探索之中。因此，要想具体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界定文化类型的主要标准说起。

众所周知，目前关于文化的概念或基本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首先是因为文化涵盖的范围过于广泛、包罗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导致人们暂时还无法找到更直接、恰当的词汇来完整地描述文化的基本形象。但是，关于界定文化的标准，目前学界并无太多的分歧，因为文化的表现及其基本特征：首先在于覆盖文化形态下的社会人口共同从事的经济生产方式，这是经济基础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其次，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人类群体所拥有的共同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全部社会人口所必须具有的共同的生活习惯，即社会风俗或习俗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一切文化事项等等，这既是界定文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文化所以发展、扩充的主要源泉；其三，由于共同的经济基础和共同的生活习惯所引发的一定范围或社会形态内的人们所拥有的共同的生活观念、基本规例或基本法则等，这也是界定文化标准的一个主要方面，并且成为直接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的动力所在。所以，从界定文化的主要标准来看：文化，事实上已经囊括了社会人群以及这个社会人群所赖以生存与繁衍的主要环境，即物质社会和意

意识形态两大领域内的主要内容，据此，我们可以对文化的概念，作出这样的基本描述，即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下，在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观念系统的表现方式。它包括了一定条件下人类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具体内容，也囊括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哲学的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所有内容^①。

顾名思义，所谓游牧文化，其实就是由游牧民族所创造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它一般通指那些以畜牧业生产活动为主要社会经济基础的人群或人类共同体所直接承载的社会观念系统的主要表现形式，这是由于经济基础的特殊作用而形成的，又是在我国国内判然有别于中原传统文化（即农耕文化）的另一种主要的文化表现方式。可以说，一定社会形态的文化表现形式，都主要地是由它所以滋生的经济基础为繁殖的“土壤”，并直接地反映着社会内部的主要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古代社会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也都是更直接地反映出这个基本特征。因此，游牧文化就是那些以从事游牧业经济为主要社会经济形态的人口所直接承载的主要的文化表现形式，这是由游牧经济的基本特征所孕育和决定的最基本的社会现象与最根本的发展趋势。

在目前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往往会根据经济领域内部所存在的种种现象或基本因素，而将相同的经济形态划分为若干更加具体的基本经济类型；同样地，由于具体生产方式和具体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即使是在相同的游牧文化的表现系统之内，事实上也存在各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诸种文化类型。这种现象，不仅世界范围内是如此，在我国境内游牧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和差异。因此，相同文化形态内存在的具体的类型差异，既是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历史学、社会学和民族学所共同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一定形态下或一定区域环境内所形成的具体文化类型，都会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有着具体的联系，这也正是我们能够直接从历史学角度，划分与区别一定形态下文化类型的最直接的和根本的切入之处。

^① 韩永年，《文化门外说略》，昭乌达蒙古师专学报增刊《北方民族文化》，1991年。

关于游牧民族类型的划分及其分布

所有的文化，以及附着于文化整体之上的文化类型等等，都毫无疑义地同时具有特定的民族学与历史学的意义，也就是说，一切文化的也都是民族的，一定的文化表现形式也同时具有十分明确的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因此，关于游牧文化表现方式的具体划分，首先即在于其必然呈现的民族特点。那么，游牧民族的划分，目前又存在着几种主要的基本类型呢？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区别与联系又如何呢？

按照《The Nomadic Alternative》^①一书的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的游牧地带，即：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至东非热带草原地带。在这个游牧地带中，牛是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牲畜，同时也有数目较多的绵羊和山羊，在靠近沙漠地带（撒哈拉沙漠南缘）也饲养着骆驼以及到处都可以适应条件的驴。在这个游牧区域中，狩猎经济微乎其微，而由妇女专门负责的园艺生产业则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他们的居住方式，主要是那些有固定设施的棚屋，这就意味着他们所从事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其实存在着更加相对的稳定（固定）性。这个游牧地带的居民与其他地带的游牧民所存在的最大区别，就是很少使用牲畜运输，而且也没有那些必须随时转徙所需要的帐篷。

非洲撒哈拉沙漠和亚洲的阿拉伯沙漠地带。在这个游牧地带中，单峰骆驼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成为向人们提供肉食的主要资源和运输的主要工具，这是由于具体的生活环境以及这个环境所提供的自然资源所决定的；在靠近沙漠的边缘地带，也同时饲养着数目较多的绵羊和山羊等其他牲畜，而且沙漠之中随处可见的绿洲以及绿洲中盛产的枣椰等食物，也成为人们食物补充的主要来源，因此，采集业事实上成为绿洲农业发展的前身。帐篷，是这个游牧地带中的主要居住用具。

地中海沿岸经安那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地带。在这个游

^① Thomas J. Barfiel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J] (引文郑君雷译), 1993 by Prentice-Hall, Inc. A Simon Schuster Company, p6—9.



牧地带中，绵羊和山羊是主要的牲畜，马、双峰骆驼和驴也是人们经营的重要畜群，但是牛的数量微乎其微，而且牛的饲养都是在农庄里进行。谷物在牧民的饮食结构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大多数都是通过交换获得，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之低。这里的游牧民使用那些由黑山羊的毛织物制作的帐篷，成为具有标志性的牧民设立营地的主要特征。

从黑海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地带。这是最著名的也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游牧地带，在这个游牧地带中，先后有诸多的游牧民族，相继建立了强大的政治组织或政权机构，创造出典型的游牧文化现象。马、牛、羊和双峰骆驼是游牧民主要经营的畜群，动以千万计的马、牛、羊群散布在茫茫无际的草野，生产不可计数的皮张、肉食和毛乳制品等，刺激了商业活动的发生与发达，双轮的轻便马车成为驰骋于草原地区的主要运输工具。那些用毛毡制作的圆顶帐篷，成为具有标志性特征的通用的居住方式。在这个游牧地带中，人们特别强调骑马和射箭的重要意义，鞍具和马镫最早的生产样品就发现于这个地带之内，因此，在这个地带之中，游牧民族对古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曾经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藏高原及其邻近的山区高原草原地带。在这个游牧地带中，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生存条件较为艰难，因此，高原草场上的畜群，也主要是以适应条件的牦牛、绵羊、山羊以及马为主，仅有少量的牛和骆驼；牦牛成为人们主要的衣食之源。商业活动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因此，交换而来的大麦成为这里游牧民的主食。

除此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两个可以视为典型游牧社会变体的特殊地带，即：

欧亚北部高纬地区游牧地带。在这个游牧地带中，游牧民主要经营以苔藓为食的驯鹿，它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饲养对象，也是游牧民的主要狩猎对象，还是向游牧民提供肉食和奶制品的主要源泉以及游牧民在冰天雪地环境中依赖的主要运输工具。因此，在这个游牧地带中，事实上已形成一种判然有别于典型游牧业经济的游牧经济类型。

南美安第斯高地游牧地带。在这个游牧地带中，游牧民主要经营和饲养那些适应高地环境的美洲骆驼，同时，也已经逐渐形成了高山农业与牧业相结合的新的经济类型。可以说，南美安第斯山高地地带，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经济文化类型。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游牧民族具体存在的生活环境与生产方式的差

异，决定了各个区域各不相同的游牧文化类型。就世界范围而言如此，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系统的再划分，也同样如此，并且还可以看出具体区域之间所存在的各不相同的明显特征。

关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区域类型的划分及其分布状况

在我国古代的北方地区，自西向东连续分布着众多的游牧群体或民族个体，有关那些部落社会的往事，已经成为今日学界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也正是由于那些简直难以计数的游牧部族或民族群体的长期分布、蔓延与发展，以及由他们所直接引发的南北方民族之间对立与战争、融合与发展的种种微妙关系，最终奠定了今日中国境内多民族统一、协调发展的基本局面。这些曾经长期存在的游牧群体或民族，有些已经在历史长河中湮没无闻，有些仍然在祖国大家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独到的历史作用。那么，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游牧群体或民族文化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是我们必须了解与阐释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综合历史文献所记录的具体史实，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可以具体地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即：

典型游牧特征的蒙古草原型。即欧亚大陆草原类型，主要包括今内蒙古高原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伯利亚部分地区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泰山南北为整体的古代游牧草原地带。曾经生活于此的游牧民族群体，先后有匈奴、鲜卑、高车（铁勒）、柔然与突厥、回鹘、蒙古等。生活在这个地域范围之内的游牧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域差别和类型差别，譬如，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泰山以南的游牧群体，已经有别于大漠草原的经济的特点，而呈现出具体的盆地草原游牧经济的特点。自古以来，生存于阿尔泰山以南的游牧群体，其主要生计特征就表现出与大漠经济类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明显特点，而且，由于阿尔泰山以南天然生成的盆地状的自然环境，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半封闭状态，其中丰沛的地上水资源，为盆地环境潜存着更大程度发展农业的可能性，这也是阿尔泰山以南草原牧场区别于其他草原地区的根本原因。

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研究
新文集

青藏高原的游牧经济类型。即西藏高原草原地区经济类型，主要包括今西藏自治区全部与青海省西部的部分地区。自古以来，这里就属于高山草原畜牧业经济类型，生存于此的游牧群体主要是吐蕃（即今藏族）。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特定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该区域内游牧经济类型，从而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古代羌戎人的草原经济类型。这是我国境内有别于其他地区游牧经济的一个区域类型，主要包括今青海省东南部、四川省北部、陕西省西北部和甘肃省大部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自古以来，生存于此的游牧群体，就是古代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羌族族系的各个分支，古代又将它们称之为西戎。这里的自然环境，呈现着高山、深谷构成的具体地貌，可以说，它们事实上有些类似前述的“高地游牧地带”，而且两者之间的基本经济特征也十分相似，即在游牧经济基础上也发展出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但由于可供开垦的河谷地带比较缺乏，所以，山地游牧业经济类型比较发达。公元3世纪以后，原来属于东部鲜卑部落集团的吐谷浑部落，也从遥远的辽东地区迁徙至此地，成为羌戎草原类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而晚唐时期曾经被吐蕃和唐朝先后征服的党项部落，则可以视为羌戎草原原生态经济文化类型发展的佼佼者。

西辽河流域及古代东北经济类型。这一类型区主要是今内蒙古东部地区及吉林省、黑龙江省北部，即今嫩江流域及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等相当广阔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古老的游牧地带，曾经先后生活的古代游牧民族主要来源于古东胡族系，上起山戎、东胡，下至鲜卑、乌桓、契丹、室韦和蒙古。生活在这里的游牧部落明显地属于草甸畜牧业的经济类型。在这里，人们不仅因地制宜地饲养着数量众多的马、牛、羊畜群，也因地制宜、适时发展更加符合区域环境优势的猪、鹿等典型游牧经济难得一见的动物驯养业，这也正是该区域区别于其他游牧地带或游牧经济类型的明显特点。事实上，检索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我们还会惊讶地发现：这种草甸畜牧业经济类型，早在两汉南北朝时期就已存在于今内蒙古东部地区，尤其是对猪、鹿的饲养与牧放，不仅呈现出更多的与典型游牧经济类型格格不入的具体特征，也塑造出该区域内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具体走向；同时，该区域内的这些基本经济特点，至今还是有力挑战目前关于游牧经济类型划分的一个具体事实，这是前述“游牧民族类型划分”中所没有包括的一项基本内容。

目前学界的研究状况 众所周知，畜牧业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

主要形式之一，游牧业可以说是畜牧业经济形态的比较发达的历史形态，但是，游牧文化则是直接形成并产生于人们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手段的社会生活之中；因此，游牧文明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完全可以媲美于农耕文明的又一种主要的文明类型。所以，关于游牧文化起源与发展问题的探讨，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以及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源及其发展状态的具体研究，就目前而言还存在着太多的欠缺。仅就国际学界的基本发展线索而言，游牧文化研究之所以引起西方学者的极大注意，还要从 20 世纪的初期说起。当时，斯坦因等人相继进行的中国西部地区考古探险以及俄国军官科兹洛夫对于内蒙古地区历史文化遗迹的盗掘、日本学者白鸟库吉、鸟居龙藏等人相继对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还有外国学者贾鲁瑟、斯文赫定等人相继对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及其周围地带进行的广泛调查与探讨等，都以其相当丰富的历史见闻、历史遗迹与巨大收获而蜚声寰宇，不仅对西方学界及其探险家们产生巨大吸引力，同时也揭开了学界广泛探讨古代游牧文化及其发展形态的浓厚兴趣。至 20 世纪 20~30 年代，相继出版了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和研究文集，如：斯坦因（Stein, Sir A.）《中国沙漠废墟记》、贾鲁瑟（Carruthers, D.）《未知的蒙古》、沙获（Shaw, R.）《南疆游记》、斯文赫定（Hedin, S.）《外喜马拉雅山》、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滨田耕作《赤峰红山后》、鸟居龙藏《契丹考古学文化图谱》、田村实造等《庆陵——关于东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岛田正郎《祖州城》、玉尔（Yule, Sir H.）《马可波罗游记》、《通往东方契丹的路》、亨廷顿（Huntington, E.）《亚洲的脉搏》、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这些书籍与研究专著的出版，很快使得关于游牧文化起源与发展研究成为一门世界级的学问，关于游牧民族及其文化形态研究的地理范围，也很快地由中国北部边疆地区推及整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甚至推及非洲大陆草原地区。但是，应该说当时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关于游牧文化研究的侧重点，依然落在古代游牧文化对于东西方世界产生的巨大推动力上。20 世纪 40~50 年代，由于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所谓“铁幕阵营”的形成与客观存在，迫使这种本来具有国际研究优势的学科发展局面陷入一种比较分散的状态，研究的重点也逐渐转移到了古代中亚草原或中央亚细亚草原地带；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中国学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的游牧文化



者及学界也逐渐与世界或国际学界分离开来。20世纪后期，苏联学者及蒙古国学者曾经联合西方学者在乌兰巴托等地召开一系列围绕游牧文化课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比较著名的有：1973年5月5~11日，在乌兰巴托举行的“游牧民族在中央亚细亚文明中的作用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大多数都是在国际学界颇负盛名的著名学者，其中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为此次大会所作的学术报告：《游牧民族历史分期的若干问题》代表了当时及其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国际学界关于游牧文化研讨的基本方向：既探讨了游牧民族在中央亚细亚历史发展中的具体作用，又弄清了游牧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中央亚细亚以及周边地区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不仅弄清了各个游牧民族系统的发展演变关系，还弄清了游牧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同时，欧文·拉铁摩尔还根据自己20世纪20~30年代曾经亲临中国北部边疆调查的原始资料，提出了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政治力量其实都是与当时秦汉帝国同时并存而共同消长的论点，并因此而受到与会学者的极大重视，成为当时关于游牧民族或游牧文化研究中比较新锐的理论突破与研究亮点。应该说，关于游牧文化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当时的西方学界由于具体原因的限制，还不可能及时有效地采纳中国学界的基本观点与发现，也不可能及时有效地深入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作出必须的调研活动，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游牧民族文化起源问题的探讨，西方学界也仅仅止步于古代中亚草原地区斯基泰文化的研究。他们首先从探索马具（如马镫、鞍辔以及骑兵装备等）的出现开始，试图揭示游牧民族历史文化对于世界历史文化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的基本原因，并由此而触及周边地区，例如关于突厥文、西夏文与契丹文的广泛研究，以及荷兰学者J.E.范·洛惠泽恩-德·黎乌关于犍陀罗文化的探讨：《斯基泰时期》等。总之，关于游牧文化的研讨似乎都是在围绕着中国的周边地带进行。事实上，关于马具等历史实物的发现，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游牧文化起源的基本问题，因为，马具的出现只是反映了一个游牧民族群体发展状态或者一支草原轻骑兵的基本形成，它属于制度文化研究的历史范畴，与学界所致力探讨的游牧文化起源与形成问题还存在着很长的一段历史距离。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前半期之内，近代人类学家摩尔根提出的关于中亚与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直接源于闪族和雅利安人迁徙与传播的单线进化论观点，曾经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着学界的研究与思考，当时学界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讨，也仅仅局缩在射猎出现的剩余和移动的狩猎者形成的游牧业、气候条件的制约、社会分工等几个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有机的统

一认识。直到 20 世纪后半期，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随着国内外学界比较充分的协作研究关系的形成，大多数学者都已经注意到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并在具体研究中开始区分出游牧业发生的两种基本形态：即原生型与次生型。前者是具有固定区域的独立起源形式，而后者是指那种起源于此却传播或发展于彼的客观存在的具体现象（即历史事实）；同时，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的区域特点与区域特征，也逐渐受到学界研究的极大重视。

自 20 世纪初期开始，国内学者也对古代北方游牧文化进行了相对广泛的研讨，著名大师如王国维、冯家昇、傅乐焕、韩儒林、岑仲勉、陈述、罗福苌、罗福颐、梁思永、李济、尹达等人，都纷纷着力于辽、金、元的历史探讨，以及北方地区历史文化遗迹的调查研究，不仅明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在具体区分出农耕经济形态的考古学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一些明显属于游牧经济形态的考古学文化，例如在赤峰红山后古文化堆积中区别出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在 20 世纪的后半期，关于游牧文化的探讨，除了关于正史中明确记录下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诸民族的历史研究外，又有马雍、孙机、乌恩、田广金等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对古代游牧民族历史文化进行器物类型学、民族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从而确立了北方青铜器研究的基本思路，开创出游牧民族马具、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及北方动物纹牌饰研究的基本方向。同时，国内学者田广金、乔晓勤等人的研究方向已经开始触及游牧文化起源这个比较艰涩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以及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系等诸多研究机构，也通过多年以来的考古发现与实践活动，进一步揭示出了古代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畜牧业经济发展的新证据，以及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研究过程中山戎文化与东胡文化分期的新线索、东胡文化中关于东部鲜卑与西部鲜卑文化区分的基本类型，还有东部鲜卑文化与早期契丹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具体探讨，等等。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游牧文化起源问题的探讨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最主要的成就是：打破既有的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彻底否定了以前关于先秦戎狄部落均属游牧民族的错误观念，确立了先秦戎狄部落主要从事畜牧—农业混合经济生产方式的基本观点，进而认为古代游牧业的起源事实上要比我们已经形成的既有认识迟慢了许多。譬如：乌恩先生认为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形成应该是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文化



春秋中期的事情^①。台湾学者王明柯认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因素的出现或者向游牧业的转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而鄂尔多斯地区游牧业的形成则要迟至春秋晚期^②。林沄先生则认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的形成是在战国中期，并且与游牧的北亚蒙古人种的大批南下存在着密切联系^③。目前国内学界已经将研究视野置放于欧亚草原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甚至有些学者已开始探讨游牧文化遗存的判定标准问题^④。

总之，在21世纪前后之交，学界关于游牧文化起源问题研讨的基本方向已经基本确立，而关于游牧文化发展的探讨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20世纪90年代初，赤峰学院（原赤峰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适时地把握住机遇，首先成立了国内唯一一家专门研究机构，即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并相继成立了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契丹辽文化研究中心和蒙古学研究中心等专门研究机构，从而将赤峰学院的历史学科基本建设工作不失时机地纳入到古代游牧文化的全面探讨之中。经过十余年的积累，目前已经相继出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部：《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方民族文化新论》、《红山文化研究》；工具书两部：《古代西辽河流域古文化研究文摘》和《红山文化举要》；学术专著十余部，如：田广林《契丹货币经济史》、《契丹礼俗考论》以及《辽海奇观》，任爱君《契丹史实揭要》与《辽代的契丹本土风貌》等，王惠德《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研究》与《日出红山后》，张国强《贡桑诺尔布与赤峰近代化》及《草原亲王府》，刘景岚《西辽河蒙地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孟凡云《辽代后妃参政现象透析》等。以上罗列，也仅是近年来赤峰学院部分历史系教师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已有二百余篇，且大多数都发表在诸如《历史研究》、《北方文物》、《社会科学辑刊》、《敦煌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以及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赤峰学院等各大学学报之上，数十篇已经被中国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全文复印转载。尤其是在

^① 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② 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业化游牧业的起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1994年。

^③ 林沄，《戎狄非胡论》，《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④ 郑君雷，《关于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及其相关问题》，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边疆考古研究》（二），2004年。

十余年来学科建设与研究过程中，相继主持并完成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近十项，已经完成与正在参与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五项。因此，正如古人在治学时所说的那样：“厚积而薄发。”我们经过长时期的资料积累工作以及专门的研讨，有信心有能力在游牧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具体探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本书着重探讨的主要问题、重点与难点 2005年8月，赤峰学院开始着手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的规划工作，身为赤峰人，怀揣着一份沉重的使命感，当然更倾情于乡土文化研究与弘扬的那一份凝重，正是本着这样的一份情感与学术发展的初衷，北方民族文化研究被纳入学院重点学科（即专门史学科）发展的一部分，同时，又恰逢内蒙古自治区“十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进入申报与审批的最后阶段。因此，在学院院长席永杰教授、德力格尔教授和历史系徐子峰教授、任爱群教授的倡议下，在学院科研处领导的关怀和帮助下，我们最终以《古代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青铜文化与游牧文化》为题，申请了自治区规划项目，经过规划办学科评审委员会的严格审查，最终获得立项准通知书！本书作为该立项项目的一部分，集中了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和历史系现有教研队伍的主要力量，采取参编人员优势组合的方式，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课题组每个成员都按时完成了自己承担的全部任务，并乐于将此研究结果公之于众，深企学界同仁与专家学者的指点和批评！

但是，如前所述，以西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古代游牧经济、文化区域（或可以称之为区域的话）的形成与发展，恰恰是位于古老的东北游牧地带之西缘，又是自古以来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类型交错分布、相互濡染比较突出的区域之一；而且，在这个古老的东北游牧文化带所显示出的具体的区域文化特点，即与标准游牧经济类型判然有别的以“杂畜”经营为主，甚至还要掺杂较多的渔猎经济方式和少量（绝不是没有）粗放式的农业经济形式。这也正是本课题进行研究与思考的主要对象。那么，在古代西辽河流域这个独特的游牧经济、文化区域中，其经济发展与文化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发展与演进的历史趋势如何，等等，都是我们致力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研究的焦点所在。

学科研究的方向、目标与任务既定之后，我们所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如何针对已经获准立项的课题做好资料整理工作，这是一项千头万绪、不能立刻见效的沉重任务，然而，课题组成员并未气馁，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地顺利完成各项资料的检索与调研工

古代西辽河流域的游牧文化

作，尤其是本书的参编人员为此付出辛勤的努力。本书研究的重点，就在于如何完整地揭示与解剖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本源，这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的交叉问题。依据我们目前具备的科学生产能力，能否有效地解决研究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是本书所有参编人员觉得最为“棘手”的主要问题之一！本书研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把握与了解古代西辽河流域，原始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具体联系和区别，如何更为正确地将他们区别开来，并寻找出两者间的微妙差异与原始的共通性，也就是说：原始的畜养业经济成分是如何发展为独立的畜牧业经济形态的？它与原始农业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应该怎样来判别？这也是具体研究过程尤为棘手的首要问题之一。

本书参编人员自然状况及编写任务的说明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十五”规划立项项目《古代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青铜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第三卷《古代西辽河流域的游牧文化》的编写任务及其人员组成，是在院、系两级领导的充分信任与亲自调派之下完成的，并在两级领导的关怀与督促之下，达成合理分工与优势组合，从而顺利完成本书的编写任务。因此，现将有关参编人员及其具体分工状况等，一一具列于下，以见班香宋艳、苏海韩潮之容！

席永杰，男，1953年生，文学学士，赤峰学院院长、教授，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内蒙古民族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

任爱君，男，1962年生，历史学博士，赤峰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自1991年以来，先后公开出版《契丹史实揭要》、《辽代的契丹本土风貌》等学术著作；先后参加内蒙古自治区项目三项，并主持完成自治区“九五”规划项目一项，获得自治区奖励两次；2001年入选为内蒙古教育厅“111工程第二层次人选”；2002年至2004年，参加国家课题项目两项，其中，担任《内蒙古通史》（八卷本）第二卷主编；2005年，主持申报自治区项目一项——《现象与阐释——契丹辽朝建立前后一些尚未揭露的隐秘情节》（已获批准）。并在《历史研究》等大型学术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目前业务方向为北方民族史暨北方民族文化史。本书绪论、结束语由席永杰、任爱君撰写。第八、九章由任爱君撰写。

杨福瑞，男，1960年生，历史学学士，赤峰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在国内外相关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本书第五、六、七章由杨福瑞撰写。

吕富华，女，1978年生，历史学硕士，赤峰学院历史系讲师。本书第三、四章由吕富华撰写。

唐玉萍，女，1957年生，赤峰学院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相继在《社会科学辑刊》、《北方文物》等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并公开出版《中国文化史概要》等学术著作，参与内蒙古自治区“十五”规划项目等课题工作。业务方向为北方民族史专业。本书第十、十一章由唐玉萍撰写。

侯志，男，1954年生，赤峰市喀喇沁旗党校教务主任、高级讲师。在国内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地方史论文数篇，并公开出版《贡桑诺尔布研究》、《清朝公主下嫁赤峰实录》（合著）等学术著作。本书第十二章由侯志撰写。

李俊义，男，1970年生，文学硕士，赤峰学院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讲师，相继在《中国书法教育》、《赤峰学院学报》和《北方文物》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并公开出版《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备忘录》（合著）、《泥莲书室文集》（与于建设联袂点校）、《静虚山房散札》、《清朝公主下嫁赤峰实录》（合著）等学术著作。本书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由李俊义撰写。

郭小丽，女，1968年生，历史学学士，赤峰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在《赤峰学院学报》等期刊公开发表论文多篇。

孙杰，女，1967年生，文学学士，赤峰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本书附录四由郭小丽、孙杰撰写。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渊源	(1)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西辽河流域主流文化的基本经济特征	(2)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西辽河流域存在的另类文化特征	(10)
第三节 古代史籍关于西辽河流域经济、文化形态的描述	(17)
第二章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的文化特征	(28)
第一节 古代西辽河流域的历史传说与人文遗存	(28)
第二节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考古学界定	(39)
第三节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区域类型与分期	(48)
第三章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的原生形态	(57)
第一节 文献记载的东胡与匈奴	(57)
第二节 古代东胡人的青铜艺术	(62)
第三节 西岔沟文化类型及其影响	(64)
第四章 西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	(69)
第一节 西汉时期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的基本形态	(69)
第二节 汉代鲜卑的考古学发现	(72)
第三节 东部鲜卑及西辽河流域的主要文化形态	(79)
第四节 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学发现	(83)
第五章 契丹游牧文化的起源	(88)
第一节 古松漠地域的自然环境	(88)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的滥觞文化